苏联文学中的奥维奇金流派

罗 岭

三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错误理论,在文学上便相应地产生了以粉饰现实为目的的“无冲突论”,这种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后期更加恶性发展而达到了高潮。在它的影响下,全部社会问题被纳入一个呆板的模式,归结为“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家们按照这个公式去进行创作,不敢接触生活的真实,不去塑造消极的反面的典型,而是逃避现实,粉饰现实,塑造一些苍白的臆想的所谓正面的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描写四平八稳的东西,于是文学作品中讽刺体裁没有了,悲剧体裁没有了,日常生活题材没有了,抒情诗没有了,描写自然和爱情也变成了文学的禁区。

在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的地方,文学上粉饰现实的现象越是突出。反对“无冲突论”的斗争也最先从那里发难。以描写农村题材为特点的奥维奇金流派也就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产生的。

苏联从一九四六年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农业经济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九五三年的农业总产量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形成这一局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所留下的影响,二是苏联农村政策的失误:例如国家对农民控制得过死,对农民征购的太多;工农产品价格悬殊;再加上一些农村干部贪脏枉法,独断专行,强迫命令,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等等。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在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中。但是由于“无冲突论”的影响,充斥于文坛上的农村文学作品则完全不顾这一严峻的现实,把农村描写成为花果满园,稻谷满仓,莺歌燕舞的乐园。例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1948)和它的续篇《阳光普照大地》(1950)、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彼尔米亚克的《珍贵的遗产》(1953)、安德烈耶夫的《宽广的流水》(1953)、卢什金的《艰难的道路》(1954)等等,都是一些甜言蜜语粉饰生活的作品。它们在内容上回避生活的真实和重大的社会矛盾,而作品中的人物则是概念化、公式化的干瘪瘪的活动影子。他们没有个性,没有内心冲突。这些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还被授予各种奖金当作样板来宣传。当时也有个别别开生面的作品,例如安东诺夫的《雨》(1951),接触到农村生活的矛盾,描写了一个条件艰苦、困难重重的农庄修桥工地,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干部,他们不同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但它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由于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而遭到评论界的批评和责难。

总之,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苏联文学由于“无冲突论”的严重影响,正处于低潮。在描写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尤其突出。这种现象使文学创作走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它反过来又助长了生活里那些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强迫命令、阿谀逢迎的腐朽作风,使得农业生产停步不前,每况愈下。苏联领导人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意识到这种文学上的落后现

象，但是不敢正视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他们企图局部改善文学状况。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真理报》发表了《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的社论，开始对“无冲突论”进行批判。社论说：“新旧事物的斗争性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而没有冲突就没有生活，大概也不会有艺术了；”“‘无冲突论’必然导致对现实作出反现实主义的歪曲和片面的描写”。“我们也有反面的典型，丑恶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还不少，伪君子也不乏其人，我们不应该害怕揭示缺点和困难，……我们需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后来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联共（布）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又指出：“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东西”，“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应该说，这种对“无冲突论”的批判，只限于承认苏联社会中有“新”与“旧”的冲突，只不过是把“新”与“旧”的冲突来代替“好”与“更好”的冲突，他们把全部落后的现象都归结为旧社会旧道德的残余，而没有看到新的历史条件新的政策和粉饰现实的需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反对“无冲突论”是表面的，软弱的，然而它给苏联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文学创作开始活跃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奥维奇金的特写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

奥维奇金（1904—1968），是一位农村文学家。他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的基础。他对农民的生活、农业劳动、农庄的组织和领导，都是非常熟悉的。他的作品都是以农民的生活作为背景的。早在1935年，他就写了《集体农庄的故事》，1939年写了《普罗斯科菲娅·马克西莫芙娜》，1941年写了《斯图卡契来客》等等作品。这些作品接触到苏联农村生活的一些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群众的思想感情，提出了他们关切的种种问题，但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

《区里的日常生活》则是奥维奇金在自己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他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敢在这篇作品里揭示了苏联农村的现实矛盾和冲突。然而，尽管已经有了《真理报》的号召，它的问世还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一九五二年的秋天，奥维奇金带着自己的手稿从宁静的俄罗斯中部尔戈夫地区乘车来到了莫斯科，亲手把稿子送到杂志的编辑部去。这时已是《真理报》发表反“无冲突论”的专论五个月之后了。然而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仍然是四平八稳粉饰现实的东西。编辑部的先生们在对这一篇集中表现生活冲突的作品感到“别开生面”之余，仍然是心有余悸。他们对作者低声地说了不少好话之后，把稿子依旧退回给他。奥维奇金在一次二次三次碰壁之后，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沮丧了。他不能在莫斯科呆下去，只好乘车回去。他已经到了火车站，马上就要离去了，但是他仍然不甘心，忽然想到还有一家《新世界》杂志。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稿子送了去。幸亏是最后一试，稿子才被发表了出来。

在这篇作品里，奥维奇金塑造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形象。他是一个巩固、保守、冷酷、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工作作风是发公文、打电话、下指示。对上起的指示，不管是否合乎政策和实际情况，都一律盲目地执行。他为了好大喜功，以国家需要为理由，对已经完成缴粮任务的农庄加码，要求它们超额上缴粮食。同时，他不顾阴雨连绵的实际情况，给各个农庄下达电话指示，动员所有的联合机和收割机以及其它一切最普通的工具，保证打谷机昼夜不停地工作，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每天缴粮任务。总之，包尔卓夫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向上爬。至于农庄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他是不问不闻的，至于农庄和农民的利益，他是在所不顾的。

作品还描写了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的形象。他的作风和包尔卓夫的作风完全不同，他联

系群众、关心生产，关心农民的生活，对于包尔卓夫的瞎指挥，要农庄超额缴粮，是坚决反对的，他和包尔卓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区里的日常生活》这篇作品问世之前，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的形象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苏联作家对这种人物是回避的，缄口不言的。奥维奇金第一次描写了这种人物形象，描写了党的官僚主义者，不只是如《真理报》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所号召的揭露“新”与“旧”的残余斗争，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一个地区的党的第一书记，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和勇敢。从苏联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区里的日常生活》这个短篇特写吹响了在文艺创作中反对“无冲突论”的号角。尽管它只不过是接触到党内的矛盾，没有描写什么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出作品的软弱的一面，但是总的说来它是震撼苏联文坛的第一声春雷，是冲破“无冲突论”帷幕的一只春燕。

《区里的日常生活》艰难问世的历程说明在苏联文艺界反“无冲突论”，不是发一两篇社论，作一两个报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苏联文学创作要取得新发展，还有待于政治生活里的重大变化和作家在创作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同志逝世，是苏联社会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真理报》在这一年里接连发表了两篇社论《克服文艺学的落后现象》、《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水平》反对“无冲突论”，不仅指出文学应该表现“新”与“旧”的斗争，而且提出了文学要“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它大大调动了文学家们的积极性，它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作家不只是生活的反映者，而且是生活的推动者。作家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反映斗争，要站在广大人民的一边，要勇敢地提出广大人民关注的问题。在苏联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苏联文艺界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这个信息如爱伦堡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小说的题名《解冻》一样，它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而在创作实践中最早反映这早春的天气的还是奥维奇金。他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三个月就在《真理报》发表了《区里的日常生活》的续篇《在前方》。《在前方》描写接近人民群众的求实派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代替了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担任了第一书记职务。它富有寓意地宣告包尔卓夫的失败和官僚主义统治的结束。

一九五四年奥维奇金在《新世界》第三期发表他的第三篇特写《在同一区里》，它与前两篇不同的是，不只是揭露一个区的官僚主义者，而且是揭露一个州的官僚主义者，不只是揭露个别的官僚主义者，而且是揭露一群官僚主义者，不只是揭露孤立的官僚主义者，而且是揭露这些官僚主义者有莫斯科大机关里的权势人物作后台，把矛盾斗争推向纵深发展。紧接着奥维奇金又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三十、三十一日《真理报》上发表他的第四篇特写《亲自动手》。在一九五六年《新世界》第三期、第五期、第八期连续发表了他的第五篇特写《艰难的春天》。这五篇特写被结集成《区里的日常生活》出版。它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欢迎，是苏联文学发展中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

这部特写集，从内容上来看，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揭露农村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它大胆地反映了农村中并非一片光明的情景，触及到农村生活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农业管理体制和政策上的毛病：例如农民在经营管理方面，在耕作劳动方面都没有自主权，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农业收成上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等等。它并且为苏联文学画廊增添了包尔卓夫的典型形象。包尔卓夫是集合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于一身的“党官僚”的代表。包尔卓夫的名字，包尔卓夫的作风很快进入苏联人民生活中，成为称呼一切官僚主义者及其风尚的通用名词。

这部特写集，从艺术形式看与过去的特写不同。它介于小说和特写之间。篇与篇之间情

节上有一定的连贯性，主要的主人公也一直是包尔卓夫、马尔登诺夫等等几个人，但是各篇又是相对独立的，它不像小说那样受情节的约束。同时作者还可以出场议论各种问题，并且自由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政论性很强。

这部特写集的巨大意义还在于它给苏联文学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象一股沁人心脾的春风，吹进了萧瑟的苏联文坛，带来了盎然的春意。我们知道，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这个动荡的年代里，许多作家趋于沉默，另外一部分作家埋头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更有一些作家放下手中的笔去投身于政治斗争。对于当代生活题材，他们望而却步。他们认为写历史题材比较容易，比较稳妥，写当代题材，不容易掌握歌颂和粉饰、批评和抹黑之间的界线，不容易捕捉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真正富于戏剧性的冲突。奥维奇金的特写则是一个突破，一个成功的范例，一个崭新的开始。它引来一大群中青年作家，紧紧地追随着他。这群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名望不高，资历不深，既没有令人称羨的文学生涯，也没有卷帙浩繁的巨著。他们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采用特写的形式，多层次地揭示了苏联农村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甚至个别以粉饰现实著名的作家，在新的形势下，也转向奥维奇金。他们汇合一起，形成了奥维奇金流派。这一派派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有：多罗什：《农村日记》（1953—1954）、《多雨的夏季》（1956）；特罗耶波利斯基：《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1954）；伏罗宁：《不需要的荣光》（1955）；卡利宁：《中等水平》（1953）、《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伊万·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阴雨天》（1954）、《不称心的女婿》（1954）、《路上的坑洼》（1956）、《死结》（1956）；扎雷金：《今年的春天》（1955）、《红色的三叶草》（1955）；索洛乌欣：《金窑》（1956）、《弗拉基米尔村道》（1954）等等。

这一文学流派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以描写农村题材为主，都采用了特写和特写式小说的文学形式。他们的作品像一股洪流冲击着苏联农村的各个方面的僵硬的左的顽固势力。

首先，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塑造了从下至上的各种农村人物群像。以与奥维奇金几乎同时而经历相同的作家特罗耶波利斯基为例，他在1953—1954年《新世界》发表的包括七篇特写的《一个农艺师的杂抄》就是一群农村人物的画册。在第一篇《顺手捞》和第二篇《老顽固》里，描写了一些处处为个人打算，小私有者心理严重的集体农庄庄员的面貌；在第三篇《夸夸其谈》里描写了懒于劳动，光爱空谈的文牍主义者；在第四篇《挂车手》里则揭露农村中一些干坏事的家伙；在第五篇《伊洛纳特》里则描写一个兼有优缺点的中间人物；在第六篇《一天》里描写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生产队长；在第七篇《普洛霍尔第十七——白铁匠大王》里则描写了一个与前篇生产队长完全对立的形象。这是一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对上逢迎、对下蛮横的官僚主义者。这个端着“铁饭碗”的农村干部，无论走到那里，就给那里带来灾难和混乱。但是他由于有上级官僚的庇护，再加上他那随机应变、善作假检讨的本领，因此不管出了多大的乱子，他都能逢凶化吉，调任新职。他就这样一连罢了十六次官，换了十七个地方，最后还混上了第十七任农庄主席的职位。特罗耶波利斯基通过对这个农村基层干部不倒翁的揭露，深刻地反映了苏联社会官僚主义的痼疾。

其次，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还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形成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官僚主义制度造成的。这一点在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里表现得最为鲜明。《死结》描写区委宣传部长曼苏罗夫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为民清命的干部。他是作为一个革新者而被提拔到区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的。但是他上台之后，农庄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原来他过去孜孜以求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追求区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他达到了这一目的之后，所作所为，就专门迎合州委书记：例如州委书记凭主观愿望要购进一批优种牛，曼苏罗夫为了迎合

他，就贸然认购了五百条，并强迫各农庄买回饲养。由于缺乏饲料和饲养的经验，优种牛接连倒毙。曼苏罗夫不引咎自责，反而还要杀一儆百，逼到发生死牛事故的那个农庄的主席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就此止步，继续强行贯彻上级轻率的命令：修建饲养车间，实际上这时农庄的燃眉之急是修缮破烂的牛棚，以保障耕牛越冬。但是他所考虑的是饲养车间是“新事物”，反对它会招来“保守落后”的非议。修葺牛棚是日常事务，吃力不讨好。“新事物”即使失败，也“怪不到自己头上”，万一成功，更有利于他向上爬。

曼苏罗夫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他不同于奥维奇金笔下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他开始给人的印象是年轻有为、果断、有头脑、勇往直前，是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干部。但是他一上台，爬上了区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之后，他就迅速地转向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一个唯上级马首是瞻的官僚主义者。他比他的前任更坏，他的前任们只不过是应声虫、传声筒，而他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有“创造性”的为非作歹者，力图利用他人的错误，踩着他人往上爬。

曼苏罗夫不是旧式的剥削者，不是一般的骗子和冒名的“发明家”。他并不从事非法的勾当，他主要是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选择最无风险，最行之有效，最通行的方法，以博取上级的欢心而实现个人的目的。

苏联的干部制度给曼苏罗夫这一类人大显身手提供了客观条件。小说以《死结》为名，对苏联的干部制度作了最深刻而彻底的揭露。

再者，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社会政治问题是怎样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以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光》为例，小说以卡秋莎·鲁柯宁娜和瓦西里·马拉霍夫的爱情故事作线索，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苏联农业管理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揭示了发人深思的主题。马拉霍夫大尉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复员回来，同集体农庄的一个挤奶员卡秋莎结了婚。生活很幸福。但是卡秋莎不安于一个普通挤奶员的位置，为追求做英雄人物没日没夜地干。果然英雄称号落到她的身上，列宁勋章也落到她的身上。于是州委书记看中了她，把她由一个普通的农庄员提拔为农庄主席。从此她青云直上，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各种荣誉铺天盖地向她袭来，她本来是既无文化，又无经验，本来既肤浅又平庸的妇女，现在被荣誉冲昏了脑袋，整天过着“伟大而高尚”的生活。完全成了一个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农庄的事业被她搞得乱糟糟的了。马拉霍夫冷眼观察到这一切，为她担心，为她着急，于是他劝告她，忠告她，尽自己可能地帮助她，而她把这一切却看成是他“嫉妒”她，反过来无理取闹，迫使他无可奈何地离家出走了。

沃罗宁通过描述官僚主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揭示两种社会冲突怎样深刻地影响到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奥维奇金非常赞许它，说它不落窠臼，非常新颖。

通过人物性格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也是老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主题。尼古拉耶娃曾以创作长篇小说《收获》著名。在那部作品里苏联农村被描写成花果飘香、歌舞升平的景象。后来她终于摆脱了“无冲突论”，参加到奥维奇金流派的行列里来。她在1954年发表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小说描写主人公娜斯嘉从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地区的拖拉机站当总农艺师。她是一个身材矮小，外貌平常的姑娘，但是她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热爱人民、对工作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而她的领导则是一个固步自封、因循保守、高枕无忧、落后不前的拖拉机站站长。她对他深为不满，积极和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她对许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指出派往区里学习方形点播法的人选不合理；厩肥无人问津；修配厂的工作一天不如一天；播种机的检修不合格等等。拖拉机站站长不仅不接受

她的批评和建议，反之，认为她是一个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没有耐心，没有纪律的人；因而反批评她，甚至处罚她，给她记过，调动她的工作，还要把她撵走。面对着这一切，娜斯嘉怎么办呢？尼古拉耶娃没有故意美化和拔高她，既描写了她朴素、文静的外表，缺乏生活经验，受到委屈容易流泪等年轻姑娘的弱点，又着力刻划她的内心的勇敢，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性格，她没有屈服，她在努力工作之余，更加深入农工的生活，为他们上课，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与此同时，她积极向区委、省委写报告，如实反映情况，最后她的斗争获得胜利。

尼古拉耶娃敏锐地抓住生活里的新事物，在大胆揭露农村落后面貌的同时塑造了娜斯嘉和拖拉机站站长两种对立的性格。通过他们性格的尖锐冲突揭示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型人物的性格特点。对于他们的胜利作了极大的肯定和歌颂。

奥维奇金流派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上述一致的东西，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作品所描写的都有具体而真实的内容，但并不局限于真人真事，作品内容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概括的结果；作品的人物也是经过作家塑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性格。因此作品具有特写风格，但又不完全是特写。所以人们把奥维奇金流派的作品称之为特写小说。特写小说多以事件为中心，通过事件揭露矛盾，提出问题。事件又多以实际生活的顺序展开，带有某种客观报导的性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社会正处在激烈动荡的变化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紧迫的和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要求作品首先反映真实情况，提出紧迫问题。因此，这种以事件为中心，提出问题的特写小说也就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了。

特写小说，因为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对人物的描写极为简洁，有的是速写式的，有的是精选式的。细节的勾画，甚至是漫画式的。人物个性刻划主要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因此，人物描写比较粗疏而不精细。这是奥维奇金流派特写小说的一个缺点。

特写小说的另一个缺点是有“急就篇”的味道。给人以头重脚轻、草草收兵的感觉。作品多以先进战胜落后的喜剧结束：官僚主义者被撤职、降职、他调、落选、受法律制裁；而先进人物则多被提拔，受到群众的拥戴。这种结局大快人心，但就斗争的复杂，矛盾的多样化来说，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奥维奇金流派是1952—1956年苏联文坛上的一股主流。它在揭露社会问题，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而在反对文学上的“无冲突论”，大胆地“写真实”和勇敢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一方面来说它给苏联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奥维奇金流派都是苏联文学中的创新者和开拓者。他们在苏联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是永远值得重视的。